

〔清〕皮錫瑞著
周予同注釋

經學歷史

中華書局

經 學 歷 史

〔清〕皮錫瑞著

周予同注釋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1 5/8。印張·218千字

1959年12月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數 7,501—15,500冊

統一書號：2013·27 定價：1.20元

經學歷史

目次

序言·····	一
凡例·····	二七
一 經學開闢時代·····	一九
二 經學流傳時代·····	四九
三 經學昌明時代·····	六九
四 經學極盛時代·····	一〇一
五 經學中衰時代·····	一四一
六 經學分立時代·····	一七〇
七 經學統一時代·····	一九三
八 經學變古時代·····	二三〇
九 經學積衰時代·····	二七四

十 經學復盛時代·····	三五
附錄一 皮鹿門先生傳略·····	三五〇
附錄二 本書引用清代人名出處表·····	三五七
重印後記·····	三五三

序言

一 經學的三大派

皮錫瑞經學歷史是經學入門書籍，可以說是「經學之導言」；本篇的任務，在介紹經學歷史於讀者之前，那不過是「經學導言之導言」而已。然而因為是經學導言之導言，所以不能不對於經學先作鳥瞰的說明，以便顯出經學史的重要性和本書的價值。

中國經學，假使我們慎重點說，上追到西漢初年為止，也已經有二千一百多年的歷史。

這二千多年中，經部書籍，因為傳統的因襲的思想關係，只就量說，也可以配得說「汗牛充棟」。不說別的，我們只要一看納蘭性德彙刊的通志堂經解，阮元、王先謙彙刊的正續清經解，也幾乎使你目眩；至若列舉朱彝尊經義考的書目，那真所謂「更僕難數」了。但是，假使我們能够應用史學家處置史料的手段，這許多繁重的著作，也不過可以歸納為三大派，所謂「經學的三大派」。這三大派都顯然自有它的立場和特色；就我的私意，可稱為一、「西漢今文學」，二、「東漢古文學」，三、「宋學」。

西漢今文學發生在西漢，就是所謂「今文十四博士」之學。在西漢時代，因為統治階級

的利用的提倡，在學術界幾有獨尊之勢。後來因爲古文學的暴興，和鄭玄、王肅的混亂家法，便漸漸的衰落。延到曹魏、西晉，因爲政亂和胡禍的過烈，連僅存的章句傳說也多隨兵燹而漸滅。一直到了清代的中末葉，因爲社會、政治、學術各方面趨勢的匯合，於是這骸骨似的今文學忽而復活，居然在學術界有「當者披靡」的現象。當時所稱爲「常州學派」、「公羊學派」，就是這西漢博士的裔孫。現在清朝覆亡已十六年，但這今文派的餘波迴響仍然在學術界裏存在着，並且似乎向新的途徑發展着。

東漢古文學，稍爲慎密地說，可以說是發生在西漢末年。到了東漢，因爲今文派自身的腐化和古文學大師的努力，大有取今文學而代之之勢。鄭玄、王肅雖說混淆家法，但究竟左祖古文學，所以魏、晉時代，今文學亡滅，而古文學反日趨於發揚開展。後來六朝的南北學，隋、唐的義疏派，雖然虛實繁簡不必盡同，但立場於古文學卻無差異。一直到了北宋慶曆以後，經學上的懷疑學派——宋學——崛起，於是這正統派的古文學暫時衰歇。但明代末期，因爲姚江學派流於虛妄，和清廷思想壓迫政策的實現，於是顧炎武扛了「舍經學無理學」的大旗來復興古文學。清代三百年學術界的權威，便被這一派所獨佔，所謂以惠棟爲領袖的「吳派」和以戴震爲領袖的「皖派」，都同東漢古文學有着血統的關係。

宋學的懷疑精神，唐代經師如啖助、趙匡、陸淳輩已開端緒，但這種風氣的盛行，卻不

能不說在北宋慶曆以後。到了南宋，因為研究方法的不同，雖可分爲以朱熹爲領袖的「歸納派」，以陸九淵爲領袖的「演繹派」和以葉適、陳傅良爲領袖的「批評派」三派；但前二派立足於哲學的見解，以理欲心性爲論究的對象，而借助於經學的解釋，卻並沒有不同。元、明以來，歸納派的朱學，因為朝廷的提倡，僥倖地取得正統的地位；而演繹派得王守仁（陽明）生力軍似的加入，也頗能得天才的學者們的信仰。但這兩派都是假借經學以言理學，結果所謂「尊德性」的固然流於禪釋，便是所謂「道問學」的也空疏無物。於是元、明二代成爲經學史上的衰落時期，而東漢古文學便乘之而復興。

上文「經學的三大派」說，自然是極其粗枝大葉的敘述；假使詳密的觀察，不僅清代復興的古文學同東漢原始的古文學不同，清代復興的今文學同西漢原始的今文學不同，元、明的宋學與北宋的宋學不同；就是各派自身的流別，以及學者自身思想的變遷，都須加以煩瑣的說明；但這決不是這簡短的篇章所能容納了。這三派的不同，簡明些說，就是今文學以孔子爲政治家，以六經爲孔子致治之說，所以偏重於「微言大義」，其特色爲功利的，而其流弊爲狂妄；古文學以孔子爲史學家，以六經爲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，所以偏重於「名物訓詁」，其特色爲考證的，而其流弊爲煩瑣。宋學以孔子爲哲學家，以六經爲孔子載道之具，所以偏重於心性理氣，其特色爲玄想的，而其流弊爲空疎。總之，三派固各有其缺點，亦各有其優

點。我們如果說，因經今文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社會哲學、政治哲學以明，因經古文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文字學、攷古學以立，因宋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形而上學、倫理學以成，決不是什麼武斷或附會的話。

最後還須附帶說明的，就是：關於經學的分派，前人有採二派說的，有採四派說的，我個人覺得都不盡妥善。二派說可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爲代表；它以爲：「自漢京以後，垂二千年，……要其歸宿，則不過漢學、宋學兩家互爲勝負。」〔一〕其後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、宋學淵源記〔二〕、阮元國史儒林傳序〔三〕都取這說。其實他們所謂「漢學」，是專指東漢古文學，並不包括西漢今文學。這樣，不正是截去經學史的首尾嗎？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前序說：「凡後世所指目爲漢學者，皆賈、馬、許、鄭之學，乃新學，非漢學也。」這種譏評的話也確有一部分理由。採取四派說的是近人劉師培。劉在經學教科書〔四〕序例中說：「大抵兩漢爲一派，三國至隋、唐爲一派，宋、元、明爲一派，近儒別爲一派。」這話也很有商榷的餘地。宋、元、明固自爲一派，兩漢及近儒不都是含有互相水火的古今文學兩派嗎？三國、隋、唐不就是古文學的支流嗎？劉氏所以有這樣的話，或者是強以時代分派的緣故。

二 經學史的重要性和它的分類

上文敘述經學的三大派，其目的不過在給讀者以經學上的簡明概念，以爲進論經學史的預備而已。

中國經學研究的時期，綿延二千多年；經部的書籍，據四庫全書總目所著錄，已達一千七百七十三部，二萬零四百二十七卷〔三〕；但是很可奇怪的，以中國這樣重視史籍的民族，竟沒有一部嚴整的系統的經學通史。自然，經學史料是異常豐富的，廣義的經學史或部分的經學史也不是絕無僅有；但是，如果說到經學通史，而且是嚴整點系統點的，那我們真不知如何回答了。皮錫瑞的經學歷史、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第一冊，固然不能說不是通史；但是以兩位近代著名的經今古文學大師，而他們的作品竟這樣地簡略，如一篇論文或一部小史似的，這不能不使我們失望了。最近日人本田成之撰支那經學史論，已由東京弘文堂出版。以具有二千多年經學研究的國度，而整理經學史料的責任竟讓給別國的學者，這在我們研究學術史的人，不能不刺骨地感到慚愧了。

況且，就是撇開這種感情的話，而只就中國其他學術的研究而言，經學通史的撰述也是決不可少的。我們研究古史學，我們能不取材於尚書、左傳、周禮等書嗎？但一談到這三部書，尚書的今古文成問題，左傳的真偽成問題，周禮是否實際的政績的記載成問題。我們研究哲學史或思想史，我們不能不論到易和春秋，但易的產生時期和思想來源成問題，春秋的

筆削命意和公、穀、左氏的異同成問題。我們研究古代民間文學，當然首及詩經，但關雎等篇的美刺成問題，靜女等篇是否戀歌成問題。最後我們說到古文字學的研究，則六書的起源，壁中古文的真偽，籀、篆、隸的變遷，無一不成問題，也無一不同經學發生密切的關係。至於將來比較宗教學、民俗學等的研究，那不僅應當探究易、禮的原始意義或背景，就是舉世斥爲妖妄怪誕而同經學有關的讖緯，也是絕好的資料。但是說，要研究哲學、文學、史學、文字學等等的學者都先要向經學下一番苦功，不是太不經濟嗎？不是太不了解學術分工的作用嗎？所以我說，在現在，經學之繼承的研究大可不必，而經學史的研究當立即開始。因爲它一方面使二千多年的經學得以結束整理，他方面爲中國其他學術開一條便利的途徑。

我這樣熱望着經學史的產生，或者會引起一般隨俗者的誤會。自然，我是十分清楚的，現在時行的口號是「打倒孔子」、「廢棄經學」；但是我所不解的，是他們打倒和廢棄的理由不够充分，不足以服頑舊者的心。我原是贊成「打倒」和「廢棄」的，但我自以爲是站在歷史的研究上的。我覺得歷史派的研究方法，是比較的客觀、比較的公平；從歷史入手，那孔子的思想和經學一些材料不適合於現代，不適合於現代的中國，自然而然地呈獻在我們的眼前。我們不必高呼口號，而打倒和廢棄的理由已了然於胸中。所以我們就是反對經學之學術史的研究，而只是立場於致用的、功利的觀點，那經學史的完成也似乎是現代的工作之一。

經學史的需要既如上述，但在中國舊有的著述中，經學通史又這樣異常缺乏；所以我們現在只得將它的範圍放寬些，以尋求性質相近而較有價值的著作。這種著作，大概可分爲三類：一、以經師爲中心的，例如胡秉虔的西京博士考〔六〕、張金吾的兩漢五經博士考〔七〕、王國維的漢魏博士考〔八〕、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、洪亮吉的傳經表、通經表，以及各史的儒林傳或儒學傳等屬之。這類著作的缺點：第一，每每是斷代的記載，不能看見經學的整個趨勢；第二，每每偏重個人的成就，而抹煞某一時代的全體表現；第三，甚至於僅有姓名而沒有事實，或附以極簡短的小傳，大有「點鬼簿」的形式。二、以書籍爲中心的，例如朱彝尊的經義考、翁方綱的經義考補正、鄭樵的通志的藝文略、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的經籍考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部，以及各史的藝文志或經籍志的經部屬之。這類著作的缺點，大致同前者相同；雖然大多數不是斷代，但不能表示經學的整個趨勢卻是一樣。三、以典章制度爲中心的，例如顧炎武的石經考、萬斯同的石經考、杭世駿的石經考異、王國維的五代兩宋監本考〔九〕都是；在古代，選舉、學校同經學也頗有密切的關係，所以通典的「選舉門」、通志的選舉略、文獻通考的選舉考、學校考也屬於這一類。這類著作的缺點，是每每羅致若干史料，加以排比，而不能顯出這種典章制度在經學上的前因後果和其相互間的關係。總之，想真切了解經學的變遷，以上三類書籍只能作爲輔助的或分門的參考資料，而仍有待於經學通

史。因爲這種原因，所以這樣簡略的皮著經學歷史竟成爲適應需要而另具價值的著作了。

三 皮錫瑞傳略

在經學史這樣需要而缺乏的時候，那皮錫瑞經學歷史有一讀的價值便瞭然可知了。現在在未談到經學歷史之前，請先介紹皮氏的生平和他的學術的大概。

皮先生名錫瑞，字鹿門，一字麓雲，湖南善化人。他表示敬仰西漢尚書今文學大師伏生，署所居曰師伏堂，學者因稱師伏先生。他早歲頗有經世之志，留意郡國利病。光緒戊戌政變時，因爲提倡新式學校制度，大受頑舊派的疾視，甚至於斥爲亂黨，交當地地方官管束。皮氏治經，宗今文，但持論平允，沒有康有爲那樣的武斷，也沒有廖平那樣的怪誕。他所著的書，除經學歷史以外，還有易經通論一卷，書經通論一卷，詩經通論一卷，三禮通論一卷，春秋通論一卷，總稱五經通論；今文尚書考證三十卷，古文尚書疏證辨正一卷，古文尚書冤詞平議二卷，尚書大傳疏證七卷，尚書中候疏證一卷，史記引尚書考六卷，禮記淺說二卷，王制箋一卷，春秋講義二卷，左傳淺說二卷，孝經鄭注疏二卷，六藝論疏證一卷，鄭志疏證八卷附鄭記考證及答臨孝存周禮難疏證，魯禮禘祫義疏證一卷，三疾疏證一卷，聖證論補評二卷，師伏堂筆記三卷，經訓書院自課文三卷，師伏堂駢文六卷，師伏堂詩草六卷，師伏堂詠

史一卷，師伏堂詞一卷等。他的著作內容，雖沒有很偉大的創見，如同時幾位著名的經今文學大師；但學術門徑很清楚，善於整理舊說；所以如經學歷史、五經通論等書，對於初學者，真可稱爲「循循善誘」。他的著作，有師伏堂自刊本，多數由湖南思賢書局刊行，流傳不很廣。惟經學歷史曾有上海羣益書局鉛印本和商務印書館影印本。

因爲皮氏是經今文學者，所以同時經古文學者都非難他。章炳麟在文錄卷一駁皮錫瑞三書中譏斥得很利害，陳漢章在經學通論〔二〕附錄中也表示着不滿意。陳氏所批評的話多屬於小疵或補正，現在撮錄章氏的話於下，以見清末今古文學派的爭辯。章氏說：

「善化皮錫瑞嘗就孝經鄭注爲之義疏，雖多持緯候，扶微繼絕，余甚多之。其後爲王制箋、經學歷史、春秋講義三書，乃大誣謬。王制箋者，以爲素王改制之書，說已荒忽；然王制法品，盡古今夷夏不可行，咎在博士，非專在錫瑞也。經學歷史，鈔疏原委；顧妄以己意裁斷，疑易、禮皆孔子所爲，愚誣滋甚。及爲春秋講義，又不能守今文師說，糅雜三傳，施之評論，上非講疏，下殊語錄，蓋牧豎所不道。又其持論，多以四庫提要爲衡。提要者，蓋於近世書目略爲完具，非復別錄、七略之儔也；其序多兩可，不足以明古今文是非；錫瑞爲之恆惑，茲亦異矣。……」

章氏是現代經古文學惟一大師，平素說經，反對劉逢祿、宋翔鳳、魏源、龔自珍，又反

對康有爲、廖平，凡近代經今文學者，沒有不受他的譏斥；那他的呵詆皮氏爲「牧豎所不道」，實毫不足怪。不過以我們第三者的眼光觀察，除春秋講義、樛雜三傳失了今文學者立場外，其餘如主王制，以易、禮爲孔子作，正是今文學所謂「微言大義」所在。至於引用四庫提要，這也是不得已的辦法，我們似應加以原諒。

我很慚愧，我所得於皮氏的生平，僅僅簡略如此。他的生卒，他的師友，他的學術的傳授，我竟無法查考。我曾輾轉地詢問幾位湖南的學者，但不是沒有回音，就是以「不知」答。當這樣離亂的時候，大家救死惟恐不暇，誰能留意他們以爲微末的事呢？據楊樹達先生說，皮氏的弟子某君擬爲他撰一年譜，我誠懇地希望着，希望他的年譜早日呈獻於讀者之前，而將我這簡短疏略的小傳捨棄掉。（按皮先生孫名振教授曾撰皮鹿門先生年譜，一九三九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，略見本書「附錄」。）

四 皮著經學歷史略評

我現在紹介皮著經學歷史於讀者，並不以爲這本書是萬分完善，毫無可議；在現在經學史這樣缺乏的時候，無論如何，這本書是有一讀的價值的。我們讀這本書時，第一，不要忘記皮錫瑞是經今文學者。因爲他立場於今文學，所以他對於宋學是不滿意的，更其是宋人的改

經刪經的方法；我們只要看他全書對於王柏的譏斥，便可了然了。又因為他立場於今文學，所以他對於經古文學也不表示絕對的崇信；他對於清代考證學的發展是相當地加以贊許，但他絕不以爲是經學研究的止境。我們明瞭了這一點，則他所主張的六經斷始於孔子，易、禮爲孔子所作，以及其他排抑左氏、譏貶鄭玄等等的話，都可以有一貫的解釋了。第二，不要忘記皮錫瑞究竟只是一個經學家而不是史學家。因為他不是史學家，所以史料的搜集不完備，史料的排比不妥善，而且每每不能客觀地記述事實，而好加以主觀的議論。他這部書，假使粗忽的翻閱，似乎不能將經古今文學、宋學的發生、變遷、異同、利弊一一顯示給我們。他不能超出一切經學的派別來記述經學，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幟之下來批評反對派。誠然，就經學說，他是沒有失掉立場；但是，就史學說，他這部書就不免有點宣傳的嫌疑了。我覺得這部書的優點和缺點都不少，但是我不願意在這簡短的「導言之導言」中絮絮地談論，更不願因此給讀者以批評的暗示。現在將這本書其他一切的優缺點讓讀者自己體味去，而只將我現在認爲是荒謬的思想揭示出來。

皮氏作這本書的時候，正是今文學復盛的時候，因為時代發展的關係，頗有我們現在以爲不對的地方。這在皮氏，自然深可原諒；但我們決不可因爲重印這部書，而使這些荒謬的思想仍然流行着。

第一，我以爲荒謬的，便是所謂「孔教救國」之說。孔子學說的真相究竟怎樣；後世儒家所描寫的孔子，後世君主所提倡的儒教，後世學者所解釋的儒學，究竟是否是真的孔子，都是絕大疑問。在這步工作還沒有完成以前，冒昧地將傳統的因襲的孔教來治國，這簡直是鬼話。皮氏在第一章中說：「後之爲人君者，必遵孔子之教，乃足以治一國；……後之爲士大夫者，亦必遵孔子之教，乃足以治一身；……此萬世之公言，非一人之私論也。」今文學者尊崇孔子，以爲他懷抱着偉大的政治思想，這在我是可以相當承認的；但不論時代，不論地域，以他主觀所得的孔教印象冒失地應用着來拯救現世，這不是很危險的嗎？

第二，所謂「六經致用」之說。經今文派以孔子爲政治家，以六經爲孔子政治思想所託，這話似乎有一部分理由，但已經有商榷的餘地。不過今文學者每喜更進一步，探求「六經致用」的史例，於是對於西漢君主利用迂儒的策略，愚而且誣地在贊歎着做做着。皮氏也不免陷於同一的錯誤。他在本書第三章中說：「前漢今文學能兼義理訓詁之長，……其學極精而有用；以禹貢治河，以洪範察變，以春秋決獄，以三百五篇當諫書，治一經得一經之益。……漢學所以有用者，在精而不在博，將欲通經致用，先求微言大義。」這些論調，就我們現在觀察起來，真有點非愚即妄。試問假使黃河決口了，你就是將禹貢由首一字背誦到末一字，你能像靈咒似的使水患平息嗎？孔子和六經的相關度，以及六經和致用的相關度，

不僅相去很遠，而且根本上還是大疑問。所以現在就是研究經學，也只能採取歷史的方法，而決不能含有些微的漢儒「致用」觀念。

第三，所謂「緯候足徵」之說。今文學家尊崇孔子爲素王，所謂「無冕的帝王」；而且相信歷代帝王欺罔民衆的技術，以爲帝王必有瑞徵，於是孔子也有所謂「感生」，所謂「受命」，所謂「告成」，於是孔子不僅是政治家，而且是教主，而且是道士了。這些感生、受命等等的鬼話，多出於緯候，今文學家因爲急急的爲素王找尋證據，於是便冒失地相信緯候了。這是第一個原因。其次，今文學者以爲天人合一之說出於西漢，如易的占驗，書的五行，詩的五際六情，禮的明堂陰陽，春秋的災異都是；今文學源於西漢經師，爲了擁護學統起見，自不能加以攻擊，於是又只得容忍這妖妄的緯候了。這是第二個原因。皮氏在第四章中說：「漢儒言災異，實有徵驗……天人本不相遠，至誠可以前知；解此，則不必非光武，亦不必非董、劉、何、鄭矣。」又說：「當時儒者以爲人主至尊，無所畏憚，借天象以示儆……此春秋以元統天，以天統君之義，亦易神道設教之旨……後世不明此義，謂漢儒不應言災異，引讖緯，於是天變不足畏之說出矣。」這類話簡直像算命賣卜者流的話，我們不能不大聲的斥爲荒謬。自然，我們不必像歐陽修似的，主張將一切緯候之說加以毀滅。它裏面包含着原始民族的信仰與儀式，夾雜着古代的學術與經說，我們將它作爲研究的材料，是非